

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結構： 政治兩極化會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嗎？*

林偉修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副教授

摘要

美中貿易戰宣告了美國與中國在國際政治的競爭局勢正式展開，2019年後的疫情更形加劇了兩國彼此的競爭關係。然而，美中對立下新冷戰的政治兩極化一定會造成國際貿易關係的兩極化嗎？世界各國真的會各自歸隊，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擇一而處，形成兩極對立的局勢嗎？還是口頭上與行為上有差異，仍然依照國家自身的利益分別和美國和中國進行實質上的往來。本文即探討這個問題，比較美中貿易戰前後，國際貿易局勢的變化到底是趨向兩極化還是非兩極化。本文認為，新冷戰的局勢下，美中對立造成的政治兩極化無法避免，但政治兩極化不等於貿易關係兩極化，本文透過威脅平衡論的觀點，說明在缺乏安全議題誘因與貿易結構的兩大因素影響下，後美中貿易戰時代的國際結構將呈現政治兩極化，但貿易多元化的局面。

關鍵詞：美中關係、新冷戰、政治兩極化、貿易多元化、有效貿易國數

* * *

* 本文在中國政治學會年會與台灣政治學會年會發表，感謝中山大學辛翠玲老師以及南華大學孫國祥老師的評論與建議。作者感謝兩位評審委員以及編輯委員會的意見，文章若有疏失，文責皆由作者負責。

壹、前言

2010年代中期，國際局勢的發展受到兩個重大國際時事的影響。第一個是從2018年開始的美中對立。2010年中國受惠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之利，躍升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強大的經濟吸引力對其他國家的投資與就業市場造成負面影響。美國國內經濟也躲不過這股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負面衝擊，產業外移，失業率升高，美國的製造業進入寒冬期（朱雲鵬等 2020）。美國勞工的經濟壓力再加上中國實力已逐漸和美國拉近的狀況之下，美國總統川普隨即在2018年開始對中國開徵高額關稅，開始了一連串美中貿易衝突。不僅是貿易對抗，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亦針對中國49家科技產業，例如華爲、海康威視等涉及國家安全有關的科技產業，做出禁止進口與使用的禁令，擴大美中衝突的面向，從貿易戰擴大到科技戰。而中國亦相對應地對美國進行反制，不但針對美國的農產品、汽車、化學品和飛機等商品課征高額關稅，並禁止美國部分商品輸入中國。

另一個影響國際局勢發展的重大國際事件則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簡稱：COVID-19）莫屬。2019年末，從中國開始的傳染性疾病急速地擴散到亞洲、歐洲和美洲國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HO）的統計，全球至今已有超過6.16億個COVID-19病例，其中造成超過654萬人的死亡，目前這些數字仍在持續增加。不只造成生命的消逝，這波疫情更是重創了各國的經濟，各國因運輸中斷造成的原物料短缺，進而使得供給鏈斷裂；同時，爲了因應疫情，各國政府採取的禁足令甚或封城令，使得市場需求大幅下降，部分產業，包括觀光旅遊業、餐飲業甚至面臨倒閉危機。COVID-19帶來經濟與生活的緊張並未促成美中兩國暫緩衝突，共同面對全球性的疫情與經濟問題。延續著2018年美中的衝突對立，疫情下的美中關係更加緊張，除了指責對方是疫情傳播者，在疫苗的供給與輸出上，疫苗政治成爲兩國另一個競爭較量的戰場（林侑靜 2021）。

可預見的，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後，美中關係的對立必然會牽動國際結構的變動。美國和中國除了要尋求彼此新的互動模式之外，也要拉攏其他國家，

共同牽制中國或美國。從這樣的邏輯來看，貿易戰後國際局勢的發展似乎漸趨向兩極化的局面，美國和中國各自拉幫結派，希望能壯大自己陣營在國際局勢中的地位與權力。因此部分學者認為，目前國際情勢正逐漸走向美中對立的新冷戰（New Cold War）時期（Zhao 2019; Ferguson 2020）。

然而，國際情勢的發展真的是照這樣的劇本走下去嗎？世界各國真的會各自歸隊，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擇一而處，形成兩極對立的局勢嗎？還是口頭上與行為上有差異，仍然依照國家自身的利益分別和美國和中國進行實質上的往來。這個問題不僅是分析國際結構的變化，更關乎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假若國際政經情勢真逐漸形成兩極，在各自都有隊友助陣下，可預期的，未來美中關係將會更加對立。反之，假若沒有走向兩極，美中關係的對立性可能就沒有預期來的那麼尖銳。

本文主要比較美中貿易戰前後，國際局勢的變化到底是趨向兩極化還是非兩極化。主要討論的是國際政治兩極化的現象是否會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貿易關係兩極與否，主要是觀察美中以外的國家在美中貿易戰前後，與美中兩國的貿易關係是否有差異。

本文所認為的兩極化意指，美中以外的國家逐漸趨向美國或中國，形成以美國和中國為首的兩個集團。非兩極化的概念就是，美中以外的國家會同時與美國與中國進行實質交流，不限定只與美國或中國往來。在用詞上，本文選擇以兩極化（polarization）取代國際關係中常提及的兩極體系（bipolarity），以非兩極化（non-polarization）取代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之所以會採用兩極化與非兩極化而不是傳統常用的兩極與多極體系，最主要的因素在於，兩極體系會產生兩極化，但兩極化不見得只發生在兩極體系。造成兩極體系與兩極化最主要的差異在於概念的定義與測量方式。現實主義學派對兩極或多極體系的測量多以國家權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為主要考量（Waltz 1979），考慮的是經濟實力或軍事能力等物質因素，但導致兩極化的原因不僅是能力因素，還可能包括文化因素、意識形態或利益等其他因素（Wagner 1993; Mao 2006），也就是說，在多極體系下，也有可能因為上述因素產生兩極化的現象。因此，本文選擇使用兩極化或非兩極化來描述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結構。

本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首先說明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的邏輯關係，並以冷戰時期各個國家的作為，說明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的關聯。同時在這個部分，也會說明美中貿易戰後，現今國際政治結構與貿易關係的狀況。其次說明為何政治兩極化沒有導致貿易關係兩極化，本文從威脅平衡論的觀點，說明政治兩極化不必然會造成貿易兩極化。第三個部分則是說明政治兩極化與貿易多元化的影響，這個影響最主要的是在美中關係的發展。最後小結。

貳、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

一、冷戰時期的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

貿易互動與國家安全議題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注的焦點之一。¹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在無政府狀態下，追求安全是國家唯一的目標，在不確定他國意圖的情況下，能擴大絕對利益（absolute advantage）的國家合作有時並非國家的首選（Waltz 1979, 105）。毫無疑問，國際貿易模型已然指出，國家之間的貿易能夠擴大兩國的經濟利益，讓出口國賺取貿易利得，進口國則能夠購買便宜的物品。然而，貿易會產生安全外部性（security externality）的問題（Grieco 1988; Gowa 1994），也就是貿易固然可增加國家財富，但是增加的國家財富可能會被轉移至購置軍事設備，將經濟資源轉移成軍事權力。在不確定他國的意圖下，與他國貿易就得承擔他國增加軍事權力，

¹ 貿易與安全議題的關係從貿易和平論（trade peace theory）後便開始引起關注，不過討論的面向甚多，Yoshimatsu（2014, 570-573）即將經濟和安全的討論整理出兩個面向：（一）經濟互賴與衝突之間的關係：這個面向關心四個議題，分別是1. 貿易互動降低衝突；2. 貿易互動降低國家之間的不確定性；3. 貿易的互賴度決定衝突與否；4. 貿易的安全外部性；（二）經濟與安全的互動與國家對外政策的關係：這個面向的議題包括1. 貿易政策是國家權力來源；2. 經濟方策（economic statecraft）。本文關注貿易的安全外部性問題，近期與本文的主題相關文獻請參閱Peter Liberman. 1996. “Trading with the Enemy: Security and Relative Gai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1): 147-175. Andrew G. Lon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2006. “Trading with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 (4): 433-451. Andrew G. Long. 2003, “Defense Pac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 (5): 537-552.

威脅自身安全的風險。為避免這類的風險，國家會選擇和聯盟夥伴貿易，使得聯盟夥伴之間的貿易量會超過非聯盟之間的貿易，因為盟國之間較無安全威脅的可能，即使盟國將增加的財富轉移至軍事權力，對自身也不會造成安全威脅。而這種聯盟內貿易大於聯盟間貿易的情況，會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在政治兩極化下會較政治非兩極化更為明顯（Gowa 1989）。²在政治兩極化下，國家只能在兩大強國之間做選擇，其他具取代性的選擇較少，因此離開聯盟的成本較高，再加上霸權國具有較強的強制力，成員國無法和各自聯盟的霸權國抗衡；因此，在霸權國主導下，各國多會選擇與聯盟成員國進行貿易往來，進而減少與敵對聯盟的成員國貿易。不僅如此，Gowa 和Mansfield（1993）發現，在安全外部性的考量下，一旦形成軍事的兩極化，貿易關係的兩極化也會隨之形成。換言之，一旦政治兩極化，無論兩極化的關係是從聯盟關係或是軍事合作關係所建立，貿易關係兩極化都會隨之發生，都會發現聯盟內的貿易會遠超過聯盟間的貿易。Long（2003）以及Long和Leeds（2006）的研究更證實了這個發現，他們的研究指出，當國家之間有了軍事上的安全承諾，這類的聯盟關係對貿易的影響，也就是聯盟內的貿易超過聯盟間的貿易將會更加顯著。

冷戰時期的國際貿易就是體現這樣的邏輯。冷戰約莫從1947年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後開始。1949年，為了防堵蘇聯入侵西歐國家，以美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包括英國、法國，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ATO）。同時，為了在經濟上封鎖蘇聯，美國在1950年聯合西歐國家成立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以下簡稱：COCOM），對蘇聯實施禁運和貿易限制，並名列兩種清單，禁止西歐國家和蘇聯和其盟國進行貿易往來，這些清單包括各項與軍事相關商品的1-A清單，以及涵蓋準策略使用商品以及可做民生與軍事使用商品的1-B清單。由於貿易禁運清單的實施，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貿易幾乎中止。根據COCOM的數據，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未成立前，1946年美國與蘇聯的貿易總額還高達2億3,600萬美元，1950年僅剩1,000

² Gowa在文章中主要討論的是兩極體系（bipolarity）和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對貿易的影響。但如同前述，本文用兩極化與非兩極化取代。

萬美元，1956年時，整個共產陣營與美國的貿易量僅剩2百萬美元不到。西方陣營與共產陣營之間的技術轉移也是相同的情況。1913年共產主義陣營還能從西方陣營獲得約16.6%的技術與生產機器的轉移，1939年更高達80%；但到了1960年代，COCOM幾乎禁止了所有共產與西方陣營之間所有的技術和生產機器的轉移（McGlade 2005, 55-56）。

由美國所主導的COCOM雖然引起美國內部企業以及歐洲國家，對於控制出口至蘇聯與份子國管制的疑慮，但就當時的國際環境，包括之後的韓戰與越戰，都讓這些管制手段獲得執行上的正當理由。也因此，一直要到1972年，美國與蘇聯重新簽訂貿易協定後，雙邊貿易關係才稍有改善。

二、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結構

美中之間是否已然形成新冷戰（New Cold War）的局面，是近期學者所關注的焦點之一。Stephen M. Walt（2019）和John J. Mearsheimer（2021）都認為，蘇聯瓦解後的90年代，美國秉持自由主義所發展出的對華外交政策徹底錯誤，錯誤地以為交往政策（engagement）能將中國帶往擁抱民主與相信自由開放的現代國家，最典型的例子就如同美國布希總統所說的：「與中國貿易可以促進中國自由化（trade with China will promote freedom）」。美國對華交往政策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當快速發展的中國，其權力與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時，便會開始威脅到美國的安全與利益。對於Mearsheimer來說，美中之間新冷戰的局面是無法避免的，2016年上台後的川普總統就是從美中競爭加劇的角度，改變以往交往政策，改以圍堵政策（containment）取代。Mearsheimer認為，美國目前對華的圍堵政策，無論是哪一個政黨的總統上台，都無法改變。Niall Ferguson（2020）承襲2019年間Henry Kissinger的說法，³認為早在2018年川普總統的貿易戰開始，美中之間的新冷戰就已經揭開序幕。2019年的疫情則是加深了兩國之間的對立，包括從美中兩國相互指責對方是病毒開始者以及疫苗成為兩國角力的工具就可探知。Kupchan（2021）則指出，美中實力的差距並不阻礙美中造成兩極化的現象，1970年代美蘇對峙時，蘇聯的

³ Henry Kissinger在Bloomberg訪問時提出，美中正處於“foothills of Cold War”

GDP也只有美國的40%。重要的是，中國已然拉遠和其他國家在權力上的距離而且逐步拉近與美國的差距，更遑論現在國際事務已經無法擺脫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互動的影響。換言之，國際社會已經無法忽視美中對立所造成兩極化的現象（Allison 2020）。

不只是重要學者對於當前美中兩國互動的看法，美國對外政策也透露出美中兩國的角力競爭。首先可以觀察的就是軍事活動。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以下簡稱：RIMPAC）是自1971年起，美國每兩年邀請太平洋地區國家共同參與的軍事演習活動，這些軍事演習活動包括實彈射擊和導彈演習、海上攔截和登艦演習、反水面作戰、反潛艦作戰以及防空兩棲登陸作戰等。1998年，美國首次邀請中國參加RIMPAC，2012年甚至邀請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參加演習。隨著美中衝突升高，2018年美國以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擴張為由，拒絕邀請中國參加RIMPAC，⁴自此中國再也沒有獲邀參加RIMPAC。2022年，美國還邀請了「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SD）」國家，包括日本、澳洲和印度參加RIMPAC，將該年參與國家的數目推展至27國，其用意也在於透過軍事演習活動聯合美國盟國，共同制衡中國的威脅。

2019年12月，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在印度洋首次聯合軍事演習。這個聯合軍事演習的發起被認為和美國與中國、俄羅斯和伊朗交惡有關，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因為美國的緣故，逐步形成戰略夥伴關係。⁵2022年1月，中國、俄羅斯和伊朗再次於印度洋聯合軍事演習，中俄伊「抗美聯盟」逐步形成；⁶同年10月，中國、俄羅斯和伊朗舉行第三度軍事聯合演習，並擴張該演習參與國家，包括阿曼和巴基斯坦等國都受邀參加該次軍事演習活動。⁷

⁴ 參見“US Disinvites China from Exercise RIMPAC 2018.” NAVALTODAY, May 24, 2018. US disinvites China from exercise RIMPAC 2018-Naval Today。

⁵ 參見「中俄伊40年來首次軍演 美國三大對手聯合引關注」。BBC，2019年12月27日。中俄伊40年來首次軍演 美國三大對手聯合引關注-BBC News 中文。

⁶ 陳佳伶，「再移師阿拉伯海軍演！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聯盟」」。TVBS新聞網，2022年1月26日。再移師阿拉伯海軍演！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聯盟」（yahoo.com）。

⁷ 廖士鋒，「今年內第二次 中俄伊海軍即將於印度洋聯合軍演」。聯合新聞網，2022年10月13日。今年內第二次 中俄伊海軍即將於印度洋聯合軍演 | 國際焦點 | 全球 | 聯合新聞網（udn.com）。

不僅是軍事活動，美國亦企圖從區域經濟圍堵中國。2017年川普總統以美國勞工的利益為考量，兌現選前的承諾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TPP）⁸。不過，TPP是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落實亞洲再平衡政策的關鍵，以排除中國為前提，並與環太平洋地區周遭的國家進行貿易合作。雖然在美國退出前TPP尚未簽訂生效，但美國的退出具有相當的意義，對於亞洲國家而言，這意味著美國更重視國內議題，為了國內政治或經濟利益，美國不惜採取條件式保護政策，即使這個決定可能會傷及亞洲國家的利益（Noland 2018）。2021年10月，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東亞峰會中提出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以下簡稱：IPEF），並在2022年5月在日本東京宣布啓動。IPEF涵蓋了印太地區13個國家，經濟產值約占全球四成，雖然IPEF的重心在不涉及一般自由貿易協定論及的關稅減免，但IPEF涉及成員國間協調出口管制，也就是說，IPEF旨在針對中國，限制成員國向中國出口具特殊性的產品。

不只在經濟上美國企圖封鎖中國，從政治與科技上，美國也企圖聯繫盟友降低中國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了除中國和俄羅斯以外約110個國家，在美國召開民主高峰會（the Summit for Democracy）。拜登總統在民主高峰會致詞時就表示：「面臨持續而且令人擔憂的挑戰，有必要警惕地保護民主價值。民主不會偶然發生，「民主在全世界都需要（捍衛它的）鬥士」，每個世界都必須予以復興。儘管民主制度可能脆弱，但他相信其固有的彈性，有能力自我修正與自我提升。」⁹毫無疑問，民主高峰會的目的在於區隔民主和非民主區隔兩大陣營，並希望民主陣營能團結共同對抗非民主陣營在科技、貿易以及傳播等各方面對民主陣營的傷害。

無論是學者的觀察或是政府的政策，美中兩國毫無疑問地已走入政治兩極化的新冷戰對抗局面。然而，確立美中兩國新冷戰的局面並不代表美中的新冷

⁸ 從美國退出TPP來看，美國對於自由貿易是否改變也是影響美國與盟友國家互動的關係之一。由於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是否發生貿易兩極化，因此暫且略過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態度。感謝評委針對這部分提出的問題。

⁹ 茅毅，「首屆「民主高峰會」揭幕，拜登致詞：民主需要鬥士」自由時報，2021年12月10日。

戰與美蘇的舊冷戰發展相同。政治的兩極化並不代表世界貿易的結構也一定會兩極化，換言之，我們需要進一步檢測美中兩國的貿易數據，觀察這段時間是否產生分別以美中兩國為中心的貿易集團現象。

三、國家間貿易互動的估計方式

衡量國家間的貿易關係目前主要有兩個方式。第一種方式是兩國之間商品貿易總值的絕對數額，例如2019年中國出口總值4,185.84億美元的商品至美國市場，同時期從美國市場進口了總值1,232.36億美元的商品。觀察貿易總值有其優點，從貿易總值的絕對數額可以知道該國在該年度與他國之間貿易逆差或順差總值，了解國家的國際收支（balance of payment）情形。但是絕對數值所能透漏的訊息並不足以讓我們判斷，到底這兩國貿易交流的情形是否熱絡，兩國的貿易關係是否重要。第二種方式則是兩國貿易的占比。以相同的例子來說，2019年中國出口總值4,185.84億美元的商品至美國市場，這個金額佔中國出口總值的16.75%，而從美國市場進口總值1,232.36億美元的商品則佔中國進口總值的5.96%。相較於絕對數值，進出口占比的衡量方式的確可以看出兩國貿易的程度，Gartzke & Li（2003）即利用占比的概念發展出貿易依賴度（trade dependence），以兩國的貿易總額佔該國GDP之比，衡量貿易的重要性。儘管如此，貿易占比或貿易依賴度仍不足以說明兩國貿易的狀況。舉個例子說明，假設B國佔A國貿易量13%，C國佔A國貿易量10%，我們可知B國的佔比會較C國貿易為高，但對A國來說，是B國重要，但C國不重要，還是B國和C國都重要。目前這兩種方式都缺乏客觀的指標來說明，兩國的貿易量或貿易占比到底要多高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林偉修（2021, 129）借用Laakso & Taagepera有效政黨數（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的概念，發展出有效貿易國數（Effective Number of Trading Countries，以下簡稱：ENTC），用以衡量貿易夥伴國對本國貿易的重要性。有效貿易國數的概念就是，在該國所有的貿易夥伴國中，若某夥伴國能夠進入有效貿易國名單之內，即代表該夥伴國的貿易占比對該國貿易具有相當重要性。有效貿易國數的算法則是：

$$ENTC = \frac{1}{\sum t_i^2} \quad (t_i : \text{貿易夥伴國}i\text{占本國貿易的比例})$$

在計算貿易比例時，我們是將貿易夥伴國*i*與中國或美國的貿易出口金額加上進口金額，而非用傳統淨出口（Net Export）的算法¹⁰。之所以採用加總的算法是考量到出口和進口對於中國或美國貿易都具有意義，出口貿易可以為中國或美國帶來貿易利得，是國家賺取外匯與刺激經濟成長的重要手段；進口貿易則是中國或美國能從國外進口較廉價的商品，穩定國內市場物價與促進國內商品需求，這些作用分別對美中兩國的國內經濟活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也因此，在計算貿易比例，本文採用加總的計算而非過往計算淨出口的方式。計算出有效貿易國的數日後，再依照貿易夥伴國佔美國（或中國）貿易的占比的排名，即可認定有效貿易國數之內的貿易夥伴國具有貿易重要性。

詮釋有效貿易國數的方式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數字本身的涵義。假設有效貿易國數為11，意指該國貿易占比排名前11名的貿易夥伴國對該國的貿易具有相當重要性。另外一個詮釋數據的重點在於數字的變化。若該國有效貿易國數增加，代表該國的貿易多元化增加，分散貿易風險。反之，若有效貿易國數減少，代表該國貿易市場較集中在部分國家，相對的，貿易風險比較高。

相較於以往使用絕對數額或貿易佔比的方式衡量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效貿易國數的計算更能說明兩國貿易對該國的重要性，儘管如此，有效貿易國數在應用上仍有部分限制。首先，有效貿易國數是基於貿易總數的分析，因此無法衡量特定產業的影響。假若研究者想了解特定產業（例如半導體產業）在兩國貿易間的重要性，那麼有效貿易國數便無法提供這類的訊息；其次，某些國家可能基於部分原因（如經濟成長）而較重視出口或進口，進而在政策上有所差異，由於有效貿易國數的計算是出口與進口總額的加總，因此在貿易加總的分析上無法考量到這個層面。由於本文的研究問題在於政治兩極化是否會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因此這兩個研究上的限制並不影響本文對問題的探究。

¹⁰ 淨出口的算法是將出口金額減去進口金額

四、貿易關係兩極化了嗎？

新冷戰下的政治兩極化使得貿易關係趨向兩極了嗎？本文從兩個方面判定貿易關係是否兩極化。首先從美國與中國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¹¹由於本文對貿易關係兩極化的定義是，美中以外的國家是否逐漸趨向僅和美國或中國貿易，形成以美國和中國為首的兩個集團，因此若貿易關係兩極化發生了，美國和中國的有效貿易國數應該都會減少。其次，觀察同為美國與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國數目的改變。如同前面對於貿易關係兩極化的定義，若兩極化發生，國家會各自歸隊於美國或中國陣營之中，那麼同為美國與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國數目就應該會減少。

本文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的貿易資料庫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ITC）的資料計算2015～2022年間，美國與中國的對外貿易數據。從這段時間兩國的貿易數據，可以簡單比較2018年美中貿易戰前後的差異。本文計算中國和美國的有效貿易國數後發現，貿易兩極化的趨勢並不明顯。根據表1，中國在中美貿易戰前的有效貿易國數是19.02（2015年）、18.95（2016年）以及19.22（2017年），這三年間美國都是中國最主要貿易夥伴國，佔中國2015～2017年間總貿易額分別是16.19%、16.03%以及15.91%。2018年貿易戰後，中國的有效貿易國數略有增加，代表中國逐漸將貿易外擴至其他市場，降低美國貿易短少對中國的衝擊，有效貿易國數從2017年的19.22逐漸增加至20.17（2018年）、22.92（2019年）、21.53（2020年）、22.49（2021年）以及24.55（2022年），美國在這些年間依然是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國，只是貿易佔比大幅減少，從2017年的15.91%，下降至2019年的13.11%，2022年更是下降至12.96%。表2則是美國的貿易狀況。從表2可知，美國的有效貿易國數在貿易戰前變化不大，2018年貿易戰前分別是12.49（2015年），12.61（2016年），

¹¹ 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可能來自於政府與市場兩個因素，本文側重政府因素，而不討論市場因素。選擇從政府的角度討論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除了因為研究題目在於政治兩極化是否導致貿易兩極化之外，更重要的是本文有效貿易國數目的計算，是加總出口和進口的貿易總額。市場因素則較偏重各個產業在產業鏈上的安排，因此較無法從市場的角度討論有效貿易國數目的改變。感謝評委的指證。

12.46（2017年）。貿易戰後，美國的有效貿易國數目略為上升，但上升幅度並不大，2018年間僅增加至12.78，2019年也僅達13.57，2022年時有效貿易國數升至最高為13.94，較貿易戰前增加1至2個重要的貿易夥伴國。中國對美國對外貿易來說依然重要，2018年前，中國佔美國貿易總額約是16.23%（2015年）、16.13%（2016年）、16.59%（2017年）以及15.98%（2018年）。受到貿易戰影響，2019年中國在美國的貿易夥伴國中排名往後掉至第三名，但很快的，2020年中國又回升至排名第一，但貿易佔比已從以往的16至17%下降至15.16%。2022年，在美國加大制衡中國的作法下，中國在美國貿易夥伴國的排名中又掉至第三名，佔美國貿易總額的13.41%。也就是說，在美中貿易戰下，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所變動，但中國或美國的有效貿易國數都增加了，貿易關係兩極化的情形從有效貿易國數的變化來看並不顯著。

另外，從共同貿易夥伴國數目的變化來看，貿易關係兩極化的現象依然不顯著。從圖一可知，2015年美國與中國共同的重要貿易夥伴國有9個，分別是日本、南韓、德國、英國、印度、巴西、台灣、加拿大和法國，這些國家對美中兩國來說，在美中貿易戰前後都扮演著關鍵的貿易夥伴。在美中貿易戰後，共同貿易夥伴國家的數目有逐漸增加的趨勢，2018年增加為11個國家，2019年甚至增加至13個。共同貿易夥伴國數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有效貿易國數增加，這個數目增加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在於美國對中國商品所課徵的高額關稅，迫使中國減少對美國出口，轉向對其他國家出口，進而增加中國的有效貿易國數。第二個原因則是轉運（transshipment），中國透過將商品轉運至第三國後，以第三國為產地重新出口，規避美國對中國商品所課徵的關稅（Tham, Yi, and Ann 2019）。無論原因為何，美中兩國的共同貿易夥伴國家數目明顯增加，也就是說，貿易戰後的國際貿易結構是否有朝向兩極化的趨勢發展，從數據上來說，貿易關係兩極化的趨勢並不明顯。

表1 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國與有效貿易國數

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9.02	18.95	19.22	20.17	22.92	21.53	22.49	24.55
1	美國 (16.19%)	美國 (16.03%)	美國 (15.91%)	美國 (15.25%)	美國 (13.11%)	美國 (13.9%)	美國 (13.73%)	美國 (12.96%)
2	日本 (8.05%)	日本 (8.43%)	日本 (8.22%)	日本 (7.86%)	日本 (7.61%)	日本 (7.49%)	日本 (6.73%)	南韓 (6.16%)
3	南韓 (7.96%)	南韓 (7.78%)	南韓 (7.61%)	南韓 (7.52%)	南韓 (6.87%)	南韓 (6.74%)	南韓 (6.56%)	日本 (6.08%)
4	台灣 (5.48%)	台灣 (5.52%)	台灣 (5.39%)	台灣 (5.42%)	台灣 (5.51%)	台灣 (6.15%)	台灣 (5.95%)	台灣 (5.44%)
5	德國 (4.52%)	德國 (4.65%)	德國 (4.56%)	德國 (4.42%)	德國 (4.46%)	越南 (4.54%)	德國 (4.26%)	越南 (4%)
6	澳洲 (3.3%)	澳洲 (3.31%)	澳洲 (3.7%)	澳洲 (3.66%)	澳洲 (4.09%)	德國 (4.53%)	越南 (4.17%)	德國 (3.87%)
7	馬來西亞 (2.81%)	越南 (3.03%)	越南 (3.32%)	越南 (3.55%)	越南 (3.91%)	澳洲 (4.04%)	澳洲 (4.16%)	澳洲 (3.76%)
8	越南 (2.64%)	馬來西亞 (2.69%)	馬來西亞 (2.6%)	巴西 (2.66%)	馬來西亞 (3%)	馬來西亞 (3.1%)	馬來西亞 (3.21%)	馬來西亞 (3.47%)
9	新加坡 (2.33%)	泰國 (2.34%)	巴西 (2.38%)	馬來西亞 (2.62%)	巴西 (2.79%)	巴西 (2.84%)	巴西 (2.96%)	俄羅斯 (3.23%)
10	英國 (2.27%)	英國 (2.3%)	俄羅斯 (2.29%)	俄羅斯 (2.56%)	俄羅斯 (2.68%)	俄羅斯 (2.54%)	俄羅斯 (2.64%)	巴西 (2.92%)
11	泰國 (2.18%)	新加坡 (2.2%)	印度 (2.29%)	印度 (2.3%)	印度 (2.24%)	泰國 (2.33%)	泰國 (2.38%)	印尼 (2.54%)
12	巴西 (2.07%)	印度 (2.17%)	泰國 (2.19%)	泰國 (2.11%)	泰國 (2.22%)	英國 (2.18%)	印度 (2.28%)	印度 (2.31%)
13	印度 (2.06%)	俄羅斯 (2.13%)	新加坡 (2.16%)	荷蘭 (2.05%)	新加坡 (2.17%)	荷蘭 (2.17%)	印尼 (2.26%)	泰國 (2.3%)
14	荷蘭 (1.97%)	巴西 (2.07%)	英國 (2.15%)	新加坡 (2%)	英國 (2.09%)	新加坡 (2.11%)	荷蘭 (2.1%)	荷蘭 (2.22%)
15	俄羅斯 (1.96%)	荷蘭 (2.07%)	荷蘭 (2.13%)	英國 (1.94%)	荷蘭 (2.06%)	印度 (2.07%)	英國 (2.04%)	沙烏地阿 拉伯 (1.97%)
16	加拿大 (1.61%)	印尼 (1.64%)	印尼 (1.72%)	印尼 (1.86%)	印尼 (1.93%)	印尼 (1.85%)	新加坡 (1.7%)	新加坡 (1.96%)

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9.02	18.95	19.22	20.17	22.92	21.53	22.49	24.55
17	印尼 (1.56%)	法國 (1.46%)	法國 (1.49%)	加拿大 (1.53%)	沙烏地 阿拉伯 (1.89%)	沙烏地阿 拉伯 (1.58%)	沙烏地阿 拉伯 (1.58%)	英國 (1.76%)
18	法國 (1.5%)	菲律賓 (1.45%)	加拿大 (1.41%)	法國 (1.52%)	法國 (1.59%)	法國 (1.58%)	墨西哥 (1.57%)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1.69%)
19	沙烏地 阿拉伯 (1.49%)	加拿大 (1.41%)	菲律賓 (1.39%)	沙烏地 阿拉伯 (1.52%)	加拿大 (1.57%)	加拿大 (1.51%)	法國 (1.55%)	加拿大 (1.64%)
20				墨西哥 (1.4%)	菲律賓 (1.47%)	菲律賓 (1.44%)	菲律賓 (1.49%)	墨西哥 (1.61%)
21					墨西哥 (1.46%)	墨西哥 (1.44%)	加拿大 (1.48%)	菲律賓 (1.49%)
22					義大利 (1.33%)	義大利 (1.3%)	義大利 (1.34%)	法國 (1.39%)
23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1.18%)			義大利 (1.33%)
24								智利 (1.14%)
25								瑞士 (0.98%)

說明：表格內（）的數字是該國佔中國出口與進口貿易總額的比例。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 (intracen.org) 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

表2 美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國與有效貿易國數

年分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2.49	12.61	12.46	12.78	13.57	13.51	13.56	13.94
1	中國 (16.23%)	中國 (16.13%)	中國 (16.59%)	中國 (15.98%)	加拿大 (14.72%)	中國 (15.16%)	中國 (14.75%)	加拿大 (14.77%)
2	加拿大 (15.29%)	加拿大 (14.89%)	加拿大 (14.9%)	加拿大 (14.63%)	墨西哥 (14.64%)	墨西哥 (14.1%)	加拿大 (14.38%)	墨西哥 (14.41%)

年分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ENTC 名次	12.49	12.61	12.46	12.78	13.57	13.51	13.56	13.94
3	墨西哥 (14.03%)	墨西哥 (14.23%)	墨西哥 (14.14%)	墨西哥 (14.35%)	中國 (13.73%)	加拿大 (13.9%)	墨西哥 (14.18%)	中國 (13.41%)
4	日本 (5.17%)	日本 (5.36%)	日本 (5.24%)	日本 (5.17%)	日本 (5.26%)	日本 (4.86%)	日本 (4.56%)	日本 (4.31%)
5	德國 (4.64%)	德國 (4.48%)	德國 (4.4%)	德國 (4.35%)	德國 (4.52%)	德國 (4.56%)	德國 (4.34%)	德國 (4.11%)
6	南韓 (3.08%)	南韓 (3.08%)	南韓 (3.08%)	南韓 (3.1%)	南韓 (3.24%)	南韓 (3.37%)	南韓 (3.51%)	南韓 (3.54%)
7	英國 (3.02%)	英國 (2.99%)	英國 (2.8%)	英國 (3%)	英國 (3.17%)	英國 (2.86%)	越南 (2.54%)	越南 (2.71%)
8	法國 (2.1%)	法國 (2.17%)	法國 (2.13%)	法國 (2.13%)	法國 (2.31%)	瑞士 (2.45%)	英國 (2.53%)	英國 (2.62%)
9	台灣 (1.79%)	印度 (1.87%)	印度 (1.93%)	印度 (2.1%)	印度 (2.24%)	越南 (2.43%)	台灣 (2.51%)	台灣 (2.57%)
10	印度 (1.78%)	台灣 (1.8%)	義大利 (1.76%)	義大利 (1.85%)	台灣 (2.07%)	台灣 (2.42%)	印度 (2.49%)	印度 (2.54%)
11	義大利 (1.62%)	義大利 (1.71%)	台灣 (1.76%)	台灣 (1.82%)	義大利 (1.96%)	印度 (2.1%)	荷蘭 (1.9%)	荷蘭(2%)
12	巴西 (1.58%)	瑞士 (1.61%)	巴西 (1.71%)	荷蘭 (1.73%)	荷蘭 (1.94%)	愛爾蘭島 (1.98%)	愛爾蘭島 (1.87%)	法國 (1.95%)
13		巴西 (1.55%)		巴西 (1.68%)	越南 (1.9%)	荷蘭 (1.92%)	瑞士 (1.87%)	義大利 (1.83%)
14					巴西 (1.78%)	法國 (1.88%)	義大利 (1.81%)	愛爾蘭島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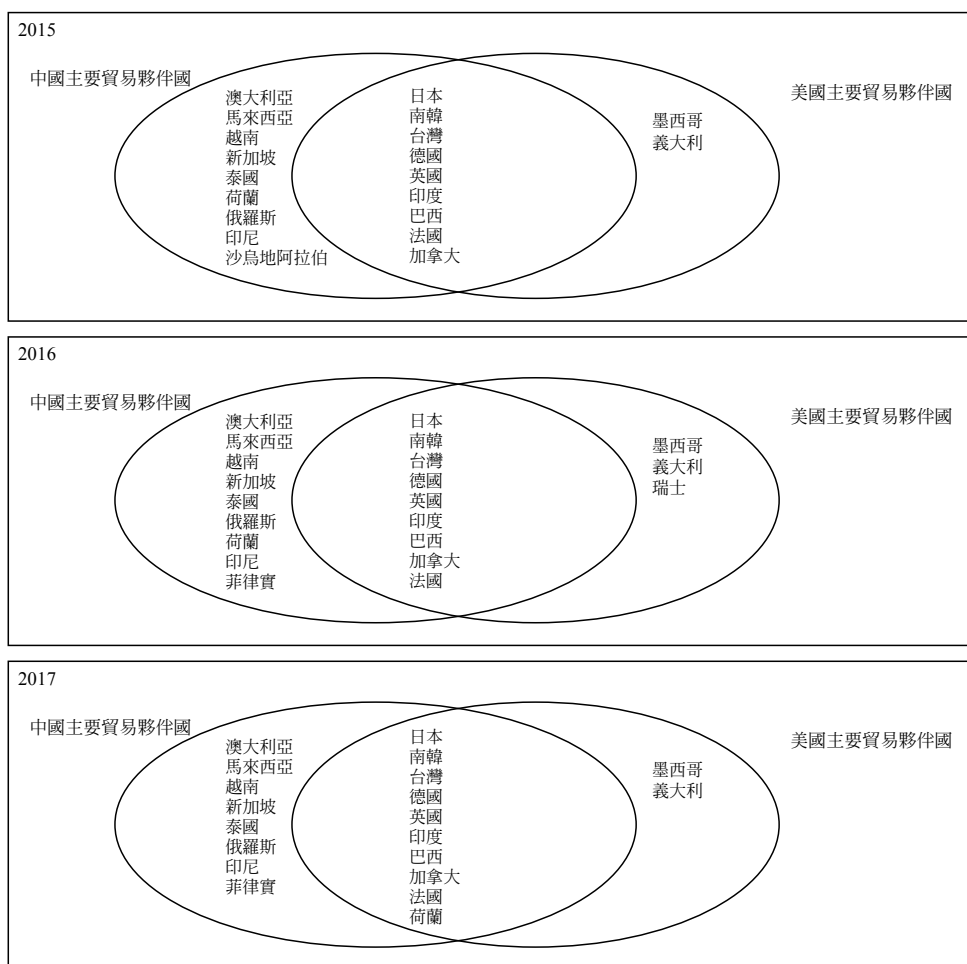
說明：表格內（）的數字是該國佔美國出口與進口貿易總額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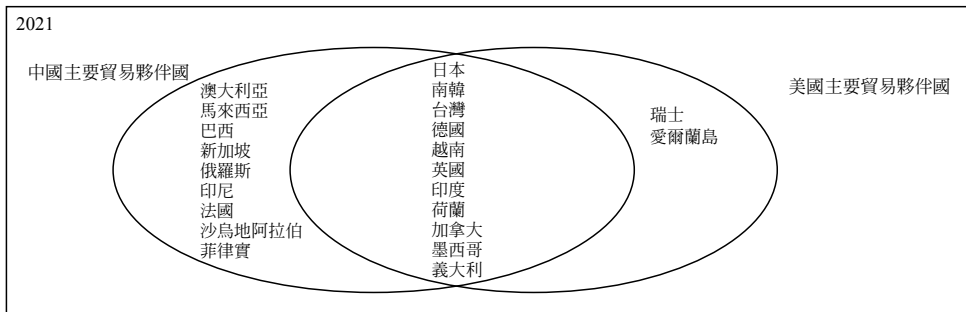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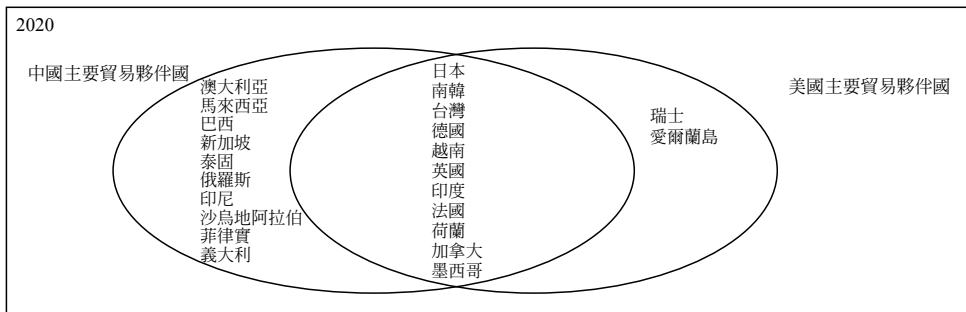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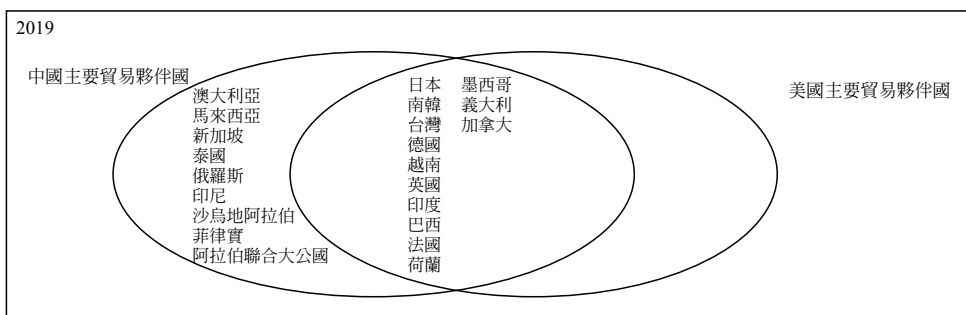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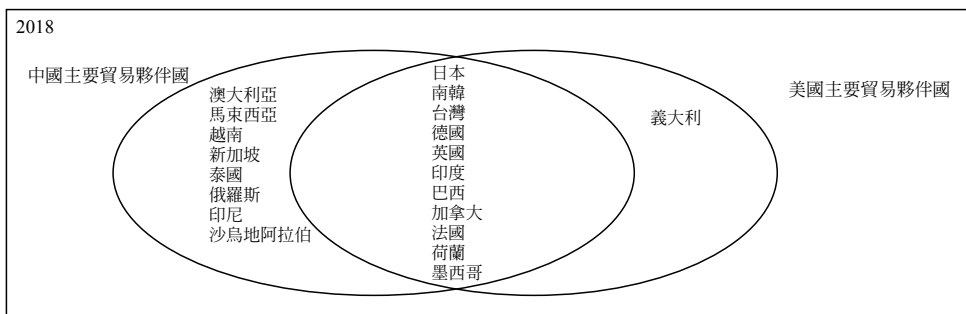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 (intracen.org) 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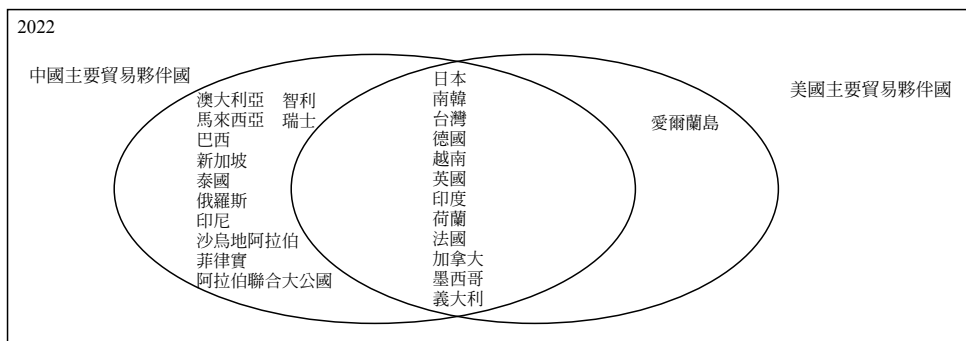
不僅從共同貿易夥伴國的數目可以觀察國際貿易關係的情況，加總共同貿易夥伴國對美以及對中貿易佔比後發現，這些國家對美貿易佔比以及對中貿易佔比都增加了（請參閱表3）。從表3可知，共同貿易夥伴國的對美貿易佔比從

2015年的38.45%增加至2022年的57.36%；對中貿易佔比從2015年的35.52%後也逐年增加，最高時在2019年增加至43.49%，2022年時和2015年做比較，這個比例也增加至37.81%。共同貿易夥伴國的對美與對中貿易佔比的改變更加說明貿易並未走向兩極化的趨勢，因為美中以外的重要貿易國家，如亞洲的日本與南韓和歐洲的德、法與英國，不但維持與美國和中國的貿易活動，更深化與兩國的貿易關係，增加對美與對中貿易佔比。

圖1 中美兩國主要貿易夥伴國的分布情形（2015~2022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3 美中兩國貿易夥伴國的貿易佔比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僅是中國的貿易夥伴國佔中國的貿易佔比	20.24%	20.86%	21.5%	19.88%	20.63%	23.13%	23.93%	27.45%
同時為美中兩國的貿易夥伴國佔中國的貿易佔比	35.52%	35.79%	35.5%	38.62%	43.49%	40.4%	38.48%	37.81%
僅是美國的貿易夥伴國佔美國的貿易佔比	15.65%	17.55%	15.9%	1.85%	0%	4.43%	3.74%	1.81%
同時為美中兩國的貿易夥伴國佔美國的貿易佔比	38.45%	38.19%	37.95%	54.06%	59.75%	54.4%	54.75%	57.36%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 (intracen.org) 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

表4進一步說明共同重要貿易夥伴國與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關係。共同重要貿易夥伴國不僅是對美國和中國而言具有貿易上的重要性，反過來，兩邊的貿易分別對這些共同貿易夥伴國而言也很重要。表4從貿易排序和貿易佔比兩方面的數據，說明中國貿易與美國貿易對這些共同重要貿易夥伴國的重要性。距離是影響兩國貿易的關鍵因素，因此可以推知，中國和亞洲國家以及美國與美洲國家必然有緊密的貿易關係。表4的數據支持這樣的觀點，表4中的國家都與美中兩國有緊密的貿易關係，但亞洲地區的日本、南韓、台灣以及印度，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的首位；美國則是美洲地區的加拿大以及墨西哥（2019年才進入名單）最重要對外貿易的國家。巴西則是比較特別的例子，中國為巴西對外第一大市場，美國反而是第二大市場。歐洲國家比較沒有出現這樣的規律，法國、荷蘭和英國與美國有較多的貿易往來；德國則是和中國有較密切的貿易關係。

表4 中國貿易與美國貿易對共同重要貿易夥伴國的貿易概況及貿易排序（貿易佔比），2015～2022年。

2015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19%)	2(15.29%)
南韓	1(23.6%)	2(11.87%)
台灣	1(22.67%)	2(11.97%)
德國	3(7.61%)	1(8.1%)
英國	3(8.27%)	2(11.64%)
印度	1(10.87%)	2(9.29%)
巴西	1(18.42%)	2(14.15%)
加拿大	2(8.1%)	1(64.85%)
法國	5(6.85%)	3(7.09%)

2016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6%)	2(15.96%)
南韓	1(23.45%)	2(12.22%)
台灣	1(23.14%)	2(11.95%)
德國	1(7.87%)	3(7.63%)
英國	3(7.43%)	2(11.34%)
印度	1(11.24%)	2(10.1%)
巴西	1(18.22%)	2(14.75%)
加拿大	2(8.13%)	1(64.04%)
法國	6(6.62%)	3(7.26%)

2017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7%)	2(15.26%)
南韓	1(22.81%)	2(11.38%)
台灣	1(24.22%)	2(11.43%)
德國	1(8.15%)	2(7.52%)
英國	3(7.51%)	2(10.91%)
印度	1(11.41%)	2(9.48%)
巴西	1(20.43%)	2(14.23%)
荷蘭	6(5.41%)	5(5.79%)
加拿大	2(8.54%)	1(63.44%)
法國	6(6.84%)	4(6.92%)

2018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37%)	2(15.08%)
南韓	1(23.56%)	2(11.59%)
台灣	1(24.29%)	2(11.8%)
德國	1(8.26%)	2(7.39%)
英國	3(7.85%)	2(11.14%)
印度	1(10.84%)	2(10.15%)
巴西	1(23.6%)	2(13.95%)
荷蘭	6(5.42%)	4(6.06%)
加拿大	2(8.75%)	1(62.93%)
法國	6(6.88%)	3(6.92%)
墨西哥	2(10.14%)	1(62.72%)

2019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1.3%)	2(15.54%)
南韓	1(23.28%)	2(12.98%)
台灣	1(24.26%)	2(13.24%)
德國	1(8.47%)	2(7.39%)
英國	3(8.25%)	1(12.13%)
印度	2(10.68%)	1(11.12%)
巴西	1(24.45%)	2(14.98%)
荷蘭	6(5.72%)	4(6.06%)
加拿大	2(8.23%)	1(62.97%)
法國	5(6.92%)	2(7.57%)
越南	1(22.59%)	2(14.63%)
墨西哥	2(9.96%)	1(62.53%)
義大利	5(4.93%)	3(6.92)

2020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3.92%)	2(14.93%)
南韓	1(24.63%)	2(13.49%)
台灣	1(26.29%)	2(13.23%)
德國	1(9.55%)	2(7.66%)
英國	3(9.08%)	1(11.17%)
印度	1(12.09%)	2(11.8%)
荷蘭	3(6.51%)	4(6.45%)
加拿大	2(9.55%)	1(60.88%)
法國	2(8.08%)	5(6.92%)
越南	1(24.52%)	2(16.74%)
墨西哥	2(10.27%)	1(63.02%)

2021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2.84%)	2(14.31%)
南韓	1(23.94%)	2(13.49%)
台灣	1(25.64%)	2(12.99%)
德國	1(9.54%)	2(7.52%)
英國	3(9.61%)	1(10.19%)
印度	2(11.46%)	1(11.7%)
荷蘭	4(6.08%)	3(6.13%)
加拿大	2(9.15%)	1(62.16%)
越南	1(24.87%)	2(16.73%)
墨西哥	2(11.15%)	1(61.51%)
義大利	4(5.42%)	3(6.51%)

2022年	中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美國貿易佔該國貿易的排序與佔比 (%)
日本	1(20.26%)	2(14.01%)
南韓	1(21.94%)	2(13.59%)
台灣	1(22.82%)	2(13.48%)
德國	1(9.74%)	2(8.08%)
英國	2(10.24%)	1(11.99%)
印度	2(9.9%)	1(11.14%)
荷蘭	6(5.6%)	3(6.51%)
加拿大	2(8.49%)	1(6.4%)
法國	5(7.53%)	3(8.03%)
越南 ¹²		
墨西哥	2(11.15%)	1(6.81%)
義大利	4(5.85%)	3(7.06%)

資料來源：ITC-Trade Impact for Good (intracen.org) 數據為筆者自行計算。

參、為何貿易關係沒有兩極化：威脅平衡的觀點

在國際關係中，安全議題影響國家行為甚深，Waltz (1979, 105-106) 認為，國家安全的不確定性使得國家會放棄和其他國家合作的機會。然而，新現實主義下國家安全的不確定性來自於無政府狀態 (anarchy) 的假設，而非國家自身的判斷與認知。由於盟國之間的安全不確定性比較低，因此兩極化之所以有助於提升自由貿易，是因為權力兩極的國家會招集各自的盟友，在安全外部性考量之下，貿易的進行多會發生在各自的集團內，少量的貿易則發生在集團間國家的貿易。而在非兩極化下，國家間對安全的不確定性增加，再加上非兩極化下的聯盟關係複雜，因此國家間的貿易行為在安全考量下便會減少 (Gowa and Mansfield 1993; Gowa 1994)。然而這樣的觀點能夠完整地描述國家行為嗎？如果這樣的觀點是正確的，為何美中對立所造成的國際政治兩極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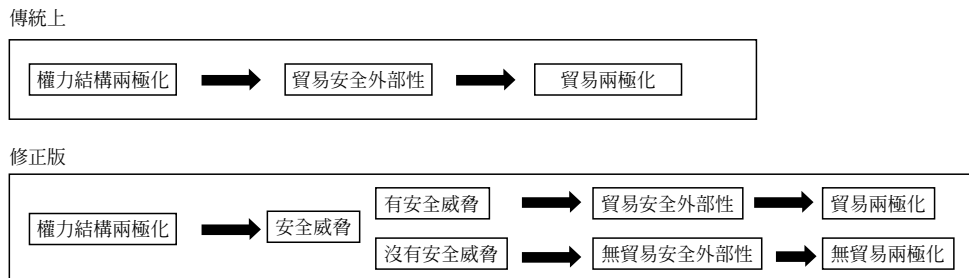
¹²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的資料庫，越南只有至2021年的資料，故留空白。

並未形成貿易關係兩極化呢？

關鍵在於威脅存在與否以及國家會如何回應威脅。Stephen Walt提供了威脅平衡的觀點描述國家行爲。¹³Walt (1987, 21-26) 認爲，威脅是個可操作的變數，可透過國家總體權力（aggregate power）、地理接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進攻權力（offensive power）以及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測量威脅。國家總體權力指的是國家綜合的物質力量，包括人口數量、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地理接近性觀察的是國家之間的地理距離，國家難免受到地理距離越近的國家在軍事與經濟等方面的威脅；他國的綜合國力越強，兩國距離越近並不代表必然成爲威脅，需視他國將這兩個要素轉換爲進攻權力的程度，這就是進攻權力的概念；侵略意圖則是認定他國主觀上侵略的意圖爲何，結合能力與意圖，這才能成爲威脅。

國家面對威脅時該如何回應，Walt認爲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選擇與他國聯合對抗威脅國的平衡（balance）方式，另一種則是採用與威脅國聯合的扈從（bandwagon）方式。總言之，威脅平衡的觀點認爲，國家之間的合作是爲了回應威脅，而非回應權力。加入國家對威脅的認知，可以使得政治兩極化與貿易兩極化之間的邏輯關係更加完善。下圖顯示傳統結構現實主義學派與本文加入國家對威脅認知的邏輯關係。

圖2 政治兩極化與貿易關係兩極化的邏輯關係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¹³ Walt的威脅平衡論主要是討論影響聯盟形成的因素，在這裡我們借用這個觀點討論國家貿易合作的可能性。

本文認為，政治兩極化是否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有兩個關鍵因素。第一個何謂威脅，是利益衝突還是安全考量，甚或只是政治上選邊的結果。筆者認為，威脅的形成原因可能造成國家在貿易關係上不同的選擇，當國家在認知上並不認為他國會帶來安全威脅，那麼國家就沒有理由選擇走向貿易關係兩極化。這也是筆者企圖在貿易的安全外部性問題上帶入威脅平衡觀點的理由。第二個則是比較成本利益的問題。面對安全威脅時，國家願意犧牲多大的經濟利益，也就是文中後續所提的政治—經濟平衡問題（Lieberman 1996）。安全威脅的產生不等於國家就會立即選擇與之對抗，這得視國家願意犧牲多少經濟利益，平衡政治—經濟之間的衝突。

本文利用這樣的觀點解釋美中貿易戰後，美中對抗下的貿易關係為何未呈現兩極化的結構。以下從威脅平衡的觀點說明，分成三個部分解釋貿易關係未兩極化的原因。

一、超級強權國與區域強權國的差異

在兩強對立的情況下，超級強權國最擔憂的是來自於另一個超級強權國的挑戰與威脅。從威脅平衡論的觀點來說，面臨另一個超級強權國的威脅，超級強權國會傾向於與他國結盟，採平衡的方式，對抗另一個超級強權國的威脅（Walt 1987, 153）。然而，區域強權國對於這種全球層級的平衡較不敏感，Walt（1987, 162-165）認為，區域強權國最關注的因素是地理接近性的問題，即使具威脅性的超級強權國的總體國力急速上升，但是當兩者的地理位置差距甚遠時，區域強權國並不會採取平衡的手段對抗超級強權國，只有當具威脅性的超級強權國與區域強權國的地理位置接近時，區域強權國才會採取平衡的手段。

從冷戰時期與現今美中對立的局面做比較，就可以理解為何貿易關係未呈現兩極化。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主要的盟友，也就是西歐國家在地理位置上甚為接近，這對西歐國家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壓力，也因此這些國家會選擇與美國結盟，共同對抗蘇聯往西發展的侵略行爲。

從這個邏輯看中國與西歐國家的關係，即使西歐國家認為中國崛起對西歐國家是個潛在的威脅，但由於地理位置差距的關係，再加上亞洲國家的牽

制，基本上，西歐國家對於聯美制中的想法並不積極。如同日前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在新加坡出席德國經濟亞太會議時提及「我知道美國有時會用更嚴厲的措辭，那不是我們的做法。在沒有疑問的方面，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不成問題。」¹⁴

亞洲的區域強權國日本與南韓對中國的態度和西歐國家稍有不同，日韓兩國與中國的關係深具矛盾，常常出現兩者關係忽冷忽熱的狀況（張雅君 2005）。之所以出現這種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因為地理接近性，日本與南韓對中國深具警戒，兩國都擔心中國崛起後為亞洲區域帶來的緊張與衝突；但另一方面，日韓兩國也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和中國有深厚的貿易關係，雙方長期呈現經熱政冷的矛盾關係。

二、侵略意圖的認定

國家認知到他國侵略的意圖時，最直接的反應就是聯合其他國共同對抗可能的侵略國（Walt 1987, 25）。冷戰時期的西歐各國，也是在1948年間蘇聯出兵捷克後，擔憂自身國家遭受蘇聯擴張入侵的威脅之下才決定在1949年共同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ATO），抵禦蘇聯可能的入侵。隨後，1955年，在西德加入NATO之後，東德、波蘭、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和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在自身安全考量之下簽署華沙公約，以對抗NATO為名，成立共產國家的政治軍事同盟，也就是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這些例子都可說明侵略意圖對國家行為的影響。

然而，中國崛起有造成各國安全議題上的威脅嗎？

這個問題可以從1990年代後期的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講起。90年代後期，中國歷經數年經濟雙位數成長，經濟與貿易實力已漸在國際市場中嶄露頭角，後續發展不容小覷。也因為這樣的成長速度，Gertz（2000）和Broomfield（2003）都認為，中國快速崛起，累積其在經濟與軍事面向的

¹⁴ Mark Hallam, Richard Walker, 「德國經濟部長：面對中國要更加謹慎。」德國之聲中文網，<https://tw.news.yahoo.com/德國經濟部長-面對中國要-更加謹慎-144900712.html>。

實力，將對美國和亞太地區國家造成安全上的威脅。這樣的論述在1990年代後期與2000年初期的確引起關注，美國前副國務卿Robert Zoellick就曾以「令人焦慮的鼎鑊（cauldron of anxiety）」來形容中國對美國所帶來的威脅¹⁵。然而，中國威脅的觀點並非是所有人的共識，Al-Rodhan（2007）即認為，中國與美國的實力有一段顯著地差距，這個差距很難在短時間內被弭平，再加上中國有內部嚴重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中國威脅在實際上可能不若理論預期來的大。更重要的是，中國威脅論在中國改採低姿態的「和平崛起」，企圖淡化中國威脅論（蕭全政 2004），以及後續國際情勢的轉變，從針對中國到面對恐怖主義的情況下，中國威脅就慢慢地退出主流論述，不僅是美國，包括美國的盟友都不再以中國威脅當成外交政策的核心價值。

從中國威脅到淡化中國威脅，中國的外交政策開始服膺鄧小平在1992年對外所宣稱的「韜光養晦，永不稱霸」路線，致力於國家發展。2001年12月中國在美國的協助下加入WTO；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市場，中國的國家發展路線獲得一定成效。這個成效在當時也反映在各國對於中國的觀點，根據美國智庫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2010年前，美國與荷蘭的民衆對中國的觀感約有4成多表示「非常／有些喜歡中國」，澳大利亞和英國甚至高達5成多的民衆持相關觀點¹⁶。Schweller和Pu（2011, 53）即認為，中國正逐漸適應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的規則，而非選擇挑戰現行規則。

2019年的疫情改變了世界各國對於中國的觀點。同樣是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結果，2020年後，有73%的外國人對中國感到反感，除了近期因新疆人權和香港反送中的爭議，中國令人反感的來源主要來自於對疫情的态度，包括中國對疫情源頭的說明以及中國對疫情處理不當導致全球性的傳染。而這些對中國反感的理由並無涉及國家安全議題抑或各國與中國的領土爭議。在沒有顯著安全考量之下，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能否直接推論到各國

¹⁵ Sushil Seth. 2005. "China causes 'cauldron of anxiety'." In Taipei Times, Oct 18th, 2005. China causes 'cauldron of anxiety'-Taipei Times。

¹⁶ 各國對於中國觀點的改變，請參閱Global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During the Xi Era, Pew Research Center。

對中國行為的轉變不無疑問。Ross (2006) 即發現，中國崛起對於霸權國家來說的確是個議題，因為這涉及霸權能否繼續維持，但中國崛起對於次級國家 (secondary states) 而言，對自身國家的政治 (安全議題) - 經濟 (經濟利益) 平衡可能更為重要，次級國家不需要像霸權國家一樣制衡崛起強國，在政治-經濟平衡的考量下，次級國家也可對崛起強國採適應 (accommodation) 的策略。¹⁷

在政治—經濟平衡的考量下，除了中國是否具安全威脅之外，美國的態度變得非常關鍵。美國能否提供貿易關係之外更多的經濟利益給聯盟的會員國，成為會員國會不會支持美國政策的關鍵因素。冷戰時期，美國在COCOM裡曾公布一份貿易清單，要求成員國與蘇聯貿易時遵守，不得出口清單內的商品予蘇聯。對於這份清單英國與西歐各國多有疑慮，因為英國與西歐各國與蘇聯有密切的能源和原物料交易，缺少了蘇聯在能源與原物料的供給，西歐國家得花費較長的時間走出二次戰爭對西歐國家經濟與建設的破壞。在英國與西歐各國對美國對蘇聯禁運的作為有所遲疑時，美國重申其對西歐國家的幫助，尤其是1947~1951年間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 對西歐國家經濟重建的幫助。這樣的聲明對西歐國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使得西歐國家決定支持美國對蘇聯禁運的政策，讓美國能透過COCOM貫徹其政策的意志 (Jackson 2001)。

2000年代後的美國，是否還具有當年承諾聯盟會員國的能力，不無疑問。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的經濟與金融實力，Kirshner (2014) 更認為，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對於美國權力有了新的異質性的想法 (New Heterogeneity)，對於美國所引領的經濟與金融秩序有所動搖，繼續持有美元的意願也會開始衰退；更重要的是，相較於美國治理的中國，世界各國有更多的想像與期待。面對這些改變，美國恐怕沒有太多著力點，改變世界各國對美國與中國相對政經情勢判斷的觀點。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中對立對於歐洲國家的影響，Goulard (2020, 59) 發現，即使美中貿易戰影響歐洲國家對中

¹⁷ Peter Liberman (1996) 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Liberman認為，傳統認為國家不應該與敵國貿易，因為與敵國貿易會增強敵國的經濟實力。但在現實中仍不乏國家與敵國貿易的例子，Liberman的說明則是，與敵國貿易涉及安全與經濟的相對考量，在經濟的相對利益遠大於安全考量時，國家仍有可能與敵國貿易。

國的出口貿易，但仍有超過75%的歐洲公司無意改變在中國營運的模式。荷蘭外長Stef Blok也發表言論：「歐洲國家對於貿易戰沒有興趣，自由貿易對荷蘭而言仍為關鍵（Nobody has an interest in trade war and free trade is crucial for the Netherlands）」¹⁸。當然更別說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今年4月訪中，回程時受訪提到歐洲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堅持歐洲國家的戰略自主。¹⁹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歐洲國家不見得對中國持有友善的觀點，但嘗試脫離從美國的觀點看中國，從歐洲自身的經濟與安全利益來看待中歐貿易關係可能更為重要且實際。

三、貿易結構因素

另一個貿易沒有兩極化的因素則是貿易結構本身。對外貿易對蘇聯與中國來說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意義。蘇聯受制於國內市場因素，出口商品多以能源以及原物料為主，並無太多製造業與電子業產品，再加上冷戰時期貿易對象多限於各自集團內的成員，東歐國家的貿易重疊性又高，因此蘇聯的對外貿易佔其GDP並不高。然而，貿易是中國國家經濟成長的引擎，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促進對外貿易，以貿易吸引外資，累積外匯存底便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既定策略，中國以世界工廠著稱，以廉價勞工與土地，吸引全球製造業進駐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換言之，中國對於貿易重視的程度遠高於蘇聯，而且能提供國際市場廉價的製造商品。

中國對貿易的重視程度傳遞了若干訊息給其他國家，首先是中國深化與其他國家貿易的意願。建立兩國貿易關係並非一蹴而成，除了滿足兩國比較利益所需，對於夥伴國的信任也是促成兩國貿易的關鍵因素，因為信任會降低交易成本，讓兩國的經濟表現更為有效率（Dyer & Chu 2003）。也因此，一旦兩國建立起貿易關係，無論是沉默成本（sunk costs）還是機會成本（opportunity

¹⁸ Pieters, J. 2019. "US-China Trade War would be Bad for Netherlands, Dutch FM says." *NL Times*. <https://nltimes.nl/2019/05/10/us-china-trade-war-bad-netherlands-dutch-fm-says> (August 9, 2023).

¹⁹ 田孟心，2023，「馬克宏：「歐洲別捲入台海問題」——為什麼他這麼迎合中國？」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5348>。

costs) 的緣故，既定的貿易關係很難被改變。

更重要訊息的是，中國對貿易的重視降低了其他國家在安全上的顧慮。Rosecrance (1986, 30-32) 認為，戰爭和貿易都是國家選擇取得資源的管道，但當貿易國家拉近國家間貿易互賴程度之後，當國家越來越仰賴透過貿易取得原料、產品和市場管道時，選擇以戰爭作為手段取得這些資源的成本就會提高，進而便會降低戰爭機率，與其他國家安全上的顧慮。Copeland (2014, 27-32) 亦提出類似的觀點，貿易降低戰爭機率的理由在於，當國家期望從貿易能夠獲得較戰爭更多利益時，戰爭便不會成為國家的選項。

基於上述理由，國際政治的兩極化並不一定會造成貿易關係兩極化。美國與中國的對峙局面，因為兩強的霸權相爭將無可避免，但雙方在國際舞台上各自的盟友，會更加考量自身政治與經濟的平衡，同時與兩大強國進行非政治上的交流。換言之，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局勢將呈現政治兩極化，貿易多元化的特殊狀況。

肆、貿易非兩極化的影響

貿易非兩極化的現象首當其衝者當然是美中競爭關係中的美國。美國要如何在貿易多元的環境下，推動冷戰時期圍堵的方式面對挑戰者中國，如何讓美國的盟友願意而且能夠犧牲甚至放棄自家經濟利益聯美制中，以美國現今的政治經濟實力恐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本文認為，貿易關係沒有兩極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會削弱美中之間的競爭關係，尤其是當美國需要盟友共同抵制中國的力道，將會受到貿易關係未兩極化的影響。如同前文所討論的，美中兩大強權所關注的議題並不必然會是區域強權國家所關心的議題，對於區域強權國家來說，取得自身政治-經濟的平衡，會較支持霸權國家維持或爭取霸權地位更為重要。而當這些區域強權國家能夠遊走在美中兩大強國，在不損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從兩國的市場取得經濟利益，美國盟友便不必然會支持美國所訂下對抗中國的政策。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近期美國所頒布的半導體政策。2022年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該法案正式生效。根

據晶片法案規定，美國政府提供527億美元補助並25%稅務減免給與在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業者，用以吸引先進半導體業者到美國設廠。補貼對象不限於美國廠商，只要是在美國設廠的業者，即使是外國廠商也可以獲得補貼與享用稅務優惠條件。這樣的補貼與稅務優惠唯一的限制就是，領取美國補貼的廠商在十年內不得在中國或對美國不友善的國家建構新廠或擴充設備。這樣的限制條件很明顯地就是在限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防止中國完成電子產業的供應鏈。面對這樣的條件限制，南韓持不同意見。三星電子（Samsung）是南韓半導體的生產主力，日前不但已經規劃在中國西安設置新廠，重要的是，三星半導體有六成以上的銷售輸往中國市場，同意接受美國補助，加入美國所建構的CHIP 4聯盟，²⁰對南韓主要的半導體產業將會造成短期內重大損失。南韓當然也明白美國制定半導體政策的用意，而且就長期來說，加入CHIP 4對南韓也有好處，畢竟目前先進半導體製程的生產機器都來自美國，只是短期內重大損失讓南韓裹足不前。不過，隨著全球通貨膨脹問題舒緩，在未來利率可能調降，半導體需求可能增加的情況下，南韓對美國禁止在中國生產半導體的要求反應更加強烈；日前，南韓半導體大廠三星以及SK海力士已經獲得美國無限期豁免，放鬆南韓對中國半導體的出口管制。²¹

伍、結論

國際政治的兩極化可能導致全球貿易的兩極化，從現實主義下貿易的安全性外部性邏輯或是冷戰時期美蘇在經濟上對峙的情況來說，似乎是必然的結果。不過在檢證2015～2022年間美國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數據後發現，經歷2018年的美中貿易戰，美中兩國的對峙帶來的國際政治兩極化並未導致全球貿易關係的兩極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落差在於結構現實主義的推論過於簡化，僅從權力結構的因素切入，忽略其他影響因素的可能；因此，本文從威脅

²⁰ CHIP 4 聯盟包括美國、日本、台灣以及南韓。

²¹ 林聰毅編譯，2023年10月9日，「及時雨，三星、SK海力士獲美國無限期豁免放鬆對陸晶片出口管制」，經濟日報，聯合新聞網。及時雨！三星、SK海力士獲美國無限期豁免 放鬆對陸晶片出口管制 | 全球財經 | 全球 | 聯合新聞網 (udn.com)。

平衡理論出發，帶入國家對威脅的認知，重新分析政治兩極化與貿易兩極化之間的關係。本文發現，對於區域強權國家來說，即使對中國並不具有正面的觀感，但中國並未對美國以外的國家造成安全上的威脅，再加上既有的貿易關係，各國基於政治-經濟平衡的考量，本就不願意承擔龐大的經濟損失，因此沒有將貿易關係趨向兩極化的動機，美中貿易戰後的國際貿易情勢依然處於經濟多元。這個現象伴隨著美中兩強競爭白熱化，形成政治兩極化，但貿易多元化的特殊局面。

政治兩極化但貿易多元化最大的影響就是衝擊美中對峙的情形。在面對美中對峙的情勢，多數人將注意力擺在美國如何制衡中國，如何在國際政治、貿易、科技和金融等方面牽制中國的發展。但鮮少人注意到，若美國要有效制衡中國，不僅要厚植美國自身的實力，也要靠美國盟友的支持，缺乏美國盟友的支持，美國得花費更多的成本才能達到一定的成效。換言之，美國牽制中國發展的成本應該包括美國補貼盟友的支出，這個支出則和各盟友國與中國在貿易上的利得有關，各國與中國的貿易利得越大，美國的支出就越大，當美國不願或無法支出這些成本時，本文認為，美中的對峙將會在力道上減弱，在時間上拉長。

政治兩極化是否導致貿易兩極化更深層的討論是冷戰與新冷戰的意涵與比較。當新冷戰已是個無可避免的局勢，那麼1947到1991年間的美蘇兩強對峙的冷戰和當前的美中兩強對峙的新冷戰相同嗎？冷戰時期，美蘇對峙不但對美國和蘇俄兩國的國內政治帶來重大影響，貿易兩極、科技競爭與代理人戰爭等冷戰時期的現象對於國際政治與經濟的改變也是不容忽視。問題是，這些冷戰時期所發生的現象都會在新冷戰時期重演嗎？這個問題需要學者對於這些現象、影響和相關理論進行一一檢視。本文認為，冷戰與新冷戰最大的差異在於美國的相對實力以及各國是否認為中國是安全威脅有關。這兩大因素有可能造成冷戰與新冷戰走向完全不同樣貌，因此新冷戰後續的發展與影響有待更多學者投入研究，發展出更貼切新冷戰特徵的理論架構。

（收件：111年12月2日，接受：112年9月14日）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ost US-China Trade War: Political Bipolarization Leads to Bipolar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ei-hsiu 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lob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dicates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the pandemic problem since 2019 deteriorates the confrontation. However, will political polarization due to the new cold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lead to economic polarization? Do countries in the whole world choose their own sid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establishing two blocs and competing? Or countries in the whole world behave inconsistently in terms of verbal promises and practical actions. National interest is still their benchmark to have substantial interaction with the U.S. and China accordingly. This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and compares the change in a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the post US-China Trade War, whether economic polarization or no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ew cold war will ineluctably lead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but political polarization doesn't mean economic polarization. With the balance of threat theory, the manifes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post US-China Trade War will b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but multi-polar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countries except for the U.S. have no security struggle with China and the trade patterns and structures remain the same.

Keywords: The U.S.-China Relati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conomic Multi-polarization, Effective Number of Trading Countries

參考文獻

- 田孟心，2023，〈馬克宏：「歐洲別捲入台海問題」—爲什麼他這麼迎合中國？〉，《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5348>，查閱時間：2023/08/09。Tian, Meng-xin. 2023. “Ma ke hong: Ouzhou bie juanru Taihai wenti- Wei shen metazhe meying hezhong guo” [Macron: Europe should not Get Involved in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Why is He Pandering to China so much]. (Accessed on August 9, 2023).
- 朱雲鵬、吳崇涵、歐宜佩，2020，《美國夢的破碎與重建：從總統大選看新冷戰與國家學習能力》，台北：時報。Zhu, Yun-peng, Chong-Han Wu, and Yi-Pei Ou. 2020. *Meiguomeng de posui yu zhongjian: Cong zongtong daxuan kan xin lengzhan yu guojia xuexi nengli* [The Brokenne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Looking at the New Cold War and National Learning Ability from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林侑靜，2021，〈大國疫苗外交的推進：東南亞區域的疫情地緣政治〉，《全球政治評論》，75：95-172。Lin, Yi-ching. 2021. “Daguo yimiao waijiao de tuijin: Dongnanya quyu de yiqing diyuan zhengzhi” [The Pushing of Vaccine Diplomacy among Great Powers: The Geopolitic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Southeast Asia].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75: 95-172.
- 林偉修，2021，〈中國崛起與美中互動關係解析（1990～2016）：權力轉移理論與貿易和平理論的應用〉，《政治學報》，72：115-151。Lin, Wei-hsiu. 2021. “Zhongguo jueqi yu meizhong hudong guanxi jiexi (1990 ~ 2016) : Quanli zhuanyi lilun yu maoyi heping lilun de yingyo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990-2016): The Applying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rade Peace Theor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2: 115-151.
- 林詠心譯，Stephen M. Walt著，2019，《以善意鋪成的地獄：菁英的僵化和霸權的衰落重啓大棋局也注定失敗的美國外交政策》，台北：麥田。Lin, Yong-xin, trans., Stephen M. Walt. 2019. *Yi shanyi pucheng de diyu: Jingying*

de jianghua he baquan de shuailuo zhongqi daqiju ye zhuding shibai de meiguo waijiao zhengce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Taipei: Rye Field.

林聰毅編譯，2023，〈及時雨，三星、SK海力士獲美國無限期豁免放鬆對陸晶片出口管制〉，<https://udn.com/news/story/6811/7494286>，查閱時間：2023/10/11。Lin, Cong-yi. 2023. “Ji shi yu, San xing、SK Hailishi Huo Meiguo Wu xian qi huo mian Fang song dui lu jing pian chu kou guan zhi” [In a Timely Move, Samsun and SK Hynix Were Granted Indefinite Exemptions from the US Relaxation of Chip Export Controls to China]. (Accessed on October 11, 2023).

茅毅，2021，〈首屆「民主高峰會」揭幕，拜登致詞：民主需要鬥士〉，《自由時報》，12月10日。Mao, Yi. 2021. “Shoujie ‘Minzhu gaofenghui’ jiemu, Baideng zhici: minzhu xuyao doushi” [The First “Democracy Summit, and Biden Delivered a Speech: Democracy Needs Fighters”]. *Liberty Times* (December 10).

張雅君，2005，〈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次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6（4）：139-184。Zhang, Ya-chun. 2005. “Zhongri guanxi de anquan kunjing: Guoji tixi yu shuangbian liyi cengci de fenxi” [Security Dilemma in Sino-Japan Relations: An Analysi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Bilateral Interest”]. *Prospect Quarterly*, 6 (4): 139-184.

陳佳伶，2022，〈再移師阿拉伯海軍演！中俄伊朗形成「抗美聯盟」〉，TVBS新聞網，<https://tw.news.yahoo.com/news/%E5%86%8D%E7%A7%B%E5%B8%AB%E9%98%BF%E6%8B%89%E4%BC%AF%E6%B5%B7%E8%BB%8D%E6%BC%94-%E4%B8%AD%E4%BF%84-%E4%BC%8A%E6%9C%97%E5%BD%A2%E6%88%90-%E6%8A%97%E7%BE%8E%E8%81%AF%E7%9B%9F-141934591.html>，查閱時間：2022/11/15。Chen, Jialing. 2022. “Zai yishi a la bo hai junyan! Zhong e yilang xingcheng ‘kangmei lianmeng’” [Move to the Arabian Navy again! China, Russia, and Iran Form

- ‘Alliance against U.S.].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22).
- 廖士鋒，2022，〈今年內第二次中俄伊海軍即將於印度洋聯合軍演〉，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7333/6682776>，查閱時間：2022/11/15。
- Liao, Shi-feng. 2022. “Jinnian nei dierci zhong e yi haijun jijiang yu yindu yang lianhe junyan” [For the Second Time this Year, the Chinese Russian, and Iranian Navies will Conduct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Indian Ocean].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22).
- 蕭全政，2004，〈論中國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22：1-30。
- Xiao, Quan-zheng. 2004. “Lun zhongguo de ‘Heping jueqi’” [On China’s Peaceful Rise]. *Taiw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1-30.
- Allison, Graham. 2020.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fter Coronavirus: Clues from History.” In Hal Brands and Francis J. Gavin, eds., *COVID-19 and World Order: The Future of Conflic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pp. 388-405.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l-Rodhan, Khalid. 2007. “A Critique of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 Systemic Analysis.” *Asian Perspective*, 31 (3): 41-66.
- BBC NEWS，2019，〈中俄伊40年來首次軍演 美國三大對手聯合引關注〉，<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923924>，查閱時間：2022/11/15。
- BBC NEWS. 2019. “Zhong e yi 40nianlai shouci junyan meiguo sanda duishou lianhe yin guanzhu” [China, Russia, and Iran’s First Military Exercise in 40 Years, the Three Major U.S. Rivals Jointly Attract Attention].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22).
- Broomfield, Emma V. 2003. “Perception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35): 265-284.
- Copeland, Dale C. 2015.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yer, Jeffrey H., and Wujin Chu. 2003. “The Role of Trustworthiness in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Korea.” *Organization Science*, 14 (1): 57-68.

- Ferguson, Niall. 2020. "From COVID War to Cold War: The New Three-Body Problem." In Hal Brands and Francis J. Gavin, eds., *COVID-19 and World Order: The Future of Conflic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pp. 417-437.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artzke, E., and Quan Li. 2003. "Measure for Measure: Concept Operationalization and the Trade Interdependence-Conflict Deb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 (5): 553-571.
- Gertz, Bill. 2000.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 Goulard, Sebastien. 2020. "The Impacts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the European Union." *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12 (1): 56-68.
- Gowa, Joanne S., and Edward D. Mansfield. 1993.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2): 408-420.
- Gowa, Joanne S. 1994.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wa, Joanne. 1989.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Free Tra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 (4): 1245-1256.
- Grieco, Joseph M. 1988.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3): 485-507.
- Hallam, Mark and Richard Walker, 2022, 〈德國經濟部長：面對中國要更加謹慎〉，德國之聲中文網，<https://tw.news.yahoo.com/德國經濟部長-面對中國要-更加謹慎-144900712.html>，查閱時間：2022/11/15。Hallam, Mark and Richard Walker. 2022. "Deguo jingji buzhang : Miandui zhongguo yao gengjia jinshen" [German Economy Minister: Be More Cautious with China]. (Accessed on November 15, 2022).
- Jackson, Ian. 2001. *The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 Britain, and East-West Trade, 1948-63*. New York: Palgrave.

- Kirshner, Jonathan. 2014. *American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upchan, Cliff. 2021. "Bipolarity is Back: Why It Matter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4 (4): 123-139.
- Liberman, Peter. 1996. "Trading with the Enemy: Security and Relative Economic Gai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1): 147-175.
- Long, Andrew G. 2003. "Defense Pac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0 (5): 537-552.
- Long, Andrew G., and Brett Ashley Leeds. 2006. "Trading with Security: Military Alliances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 (4): 433-451.
- Mao, Zeev. 2006. "Network Polarization, Network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6-200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3 (4): 391-411.
- McGlade, Jacqueline. 2005. "COCOM and the Containment of Western Trade and Relations." In Jari Eloranta and Jari Ojala, eds., *East-West Trade and the Cold War*, pp. 47-62. Finland: University Library of Jyväskylä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2021.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100 (6): 48-58.
- NAVALTODAY. 2018. "US Disinvites China from Exercise RIMPAC 2018." <https://www.navaltoday.com/2018/05/24/us-disinvites-china-from-exercise-rimpac-2018/> (November 15, 2022).
- Norland, Marcus. 2018. "US Trade Policy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3: 262-278.
- Pieters, J. 2019. "US-China Trade War would be Bad for Netherlands, Dutch FM says." *NL Times*. <https://nltimes.nl/2019/05/10/us-china-trade-war-bad-netherlands-dutch-fm-says> (August 9, 2023).
- Rosecrance, Richard.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ss, Robert 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3): 355-395.
- Schweller, Randall, and Xiaoyu Pu. 2011.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6 (1): 41-72.
- Seth, Sushil. 2005. "China causes 'cauldron of anxiety'."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05/10/18/2003276316> (November 15, 2022).
- Tham, Siew Yean, Andrew Kam Jia Yi, and Tee Beng Ann. 2019. "US-China Trade War: Potenti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pillovers into Malaysia." *Asian Economic Paper*, 18 (3): 117-135.
- Wagner, R. Harrison. 1993. "What was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1): 77-106.
-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Yoshimatsu, Hidetaka. 2014. "Economic-Security Linkages in Asia." In Saadia M. Pekkanen, John Ravenhill and Rosemary Foot, eds., *Oxford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pp. 569-5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Ming-hao. 2019. "Is a New Cold War Inevitable?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2 (3): 371-394.

